

รูปแบบเศรษฐกิจ-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องยูนนานและ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กับรัฐใน ราชวงศ์หยวน

เจียงจ้าวจง¹ ฟ่านหมิงซิน² เซตา การาดัซ³

1. นักศึกษาปริญญาเอกสาข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ชิงหว่าซินจู่ 300044 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อีเมล: jiangzhaozhong@foxmail.com

2. นักศึกษาปริญญาโทสาขาภาษาไท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สงขลานครินทร์ วิทยาเขตปัตตานี 94000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อีเมล: mingxin.f@psu.ac.th

3. นักศึกษาปริญญาเอกสาขา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เทคโนโล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ชิงหว่าซินจู่ 300044

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อีเมล: sedakaratas@outlook.com

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5 กุมภาพันธ์ 2564 แก้ไขบทความ: 27 มิถุนายน 2564 ตอ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29 มิถุนายน 2564

บทคัดย่อ: บทความวิจัยเรื่องนี้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เพื่อศึกษา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ของชาวยูนนานกับรัฐในราชวงศ์หยวน ภายใต้ปรากฏการณ์กลุ่มชาติพันธุ์ที่มี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 วัฒนธรรม และภาษาคลายคลึงกันแต่มีปฏิกริยาต่อรัฐแตกต่างกัน โดยใช้ทฤษฎีเศรษฐกิจ-วัฒนธรรมในการจำแนกกลุ่มประชากรยูนนาน

ผลการวิจัยพบว่า บทบาทของรัฐ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ภายใต้เศรษฐกิจ-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ต่างกัน ดังนั้นจึงส่งผลทำให้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ที่มีต่อรัฐ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ต่างกันด้วย โดยกลุ่มชาติพันธุ์ที่ดำรงชีพด้วยการล่าสัตว์เก็บของป่าและทำประมงที่พูดภาษาโลโลอิชและกลุ่มชาติพันธุ์ที่ดำรงชีพด้วยการทำเกษตรแบบไร่เลื่อนลอยที่พูดภาษาโลโลอิชและภาษาไทนั้น รัฐมีอิทธิพลต่อกิจ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ลิต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น้อย ดังนั้น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กับรัฐจึงค่อนข้างเหินห่าง เกษตรกรที่ทำเกษตรกรรมแบบขุดตากทางตอนเหนือในเขตร้อนที่พูดภาษาไทและเกษตรกรที่ทำเกษตรกรรมแบบไถพรวนบริเวณแอ่งที่ราบสูงกึ่งเขตร้อนที่พูดภาษาจีน-ทิเบต รัฐมีบทบาทสำคัญต่อการถือครองที่ดินและแหล่งน้ำ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 ดังนั้นพวกเขาจึงมี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ค่อนข้าง

ใกล้ชิดกับรัฐ สำหรับชนเผ่าเร่ร่อนที่พูดภาษาโลโลอิช ภาษาน่าซี และภาษาพูมินั้น เมื่อพวกเขาเลี้ยงสัตว์บนแผ่นดินของรัฐ ทรัพยากรที่ดินและแหล่งน้ำของรัฐ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ต่อพวกเขา ดังนั้นจึงต้องการการดำรงอยู่ของรัฐ ส่วนชนเผ่าเร่ร่อนที่อาศัยอยู่นอกราชอาณาจักร พวกเขาก็ต้องการการดำรงอยู่ของรัฐเช่นกันเนื่องจากต้อง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สินค้ากับ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อยู่ภายใต้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ของรัฐ

คำสำคัญ: ยูนนาน; ราชวงศ์หยวน; รูปแบบเศรษฐกิจ-วัฒนธรรม; 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 in the Yuan's Yunnan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State

JIANG Zhaozhong¹ FAN Mingxin² Seda KARATAŞ³

1. Institute of History, Hsinchu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300044, P. R. China

Email: jiangzhaozhong@foxmail.com

2.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attani Campus,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Pattani, 94000, Thailand

Email: mingxin.f@psu.ac.th

3. Colleg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Hsinchu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300044,
P. R. China

Email: sedakaratas@outlook.com

Received: 05th February 2021

Revised: 27th June 2021

Accepted: 29th June 2021

Abstract: In historical works, the population in Yunnan a borderland province having multiple ethnicities are always categorised by their ethnical or linguistic backgrounds, but this kind of categorisation cannot explain the situation that sometimes ethnicities having similar ethnical or linguistic backgrounds reacted to the state in different ways. So, for comprehend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population and state, focusing on the Yuan Dynasty w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ce again began to rule Yunnan directly, the paper categoris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 theory. And it is found that because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state in different economic-cultural types were correspondingly different, the people living on

different economic-cultural types had correspondingly different kinds of relations with the state.

Keywords: Yunnan; the Yuan Dynasty; Economic-Cultural Types; Relationship

元代云南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姜照中¹ 范明新² Seda Karatas³

1. 新竹清华大学, 历史研究所, 新竹, 300044, 中国

电子邮箱: jiangzhaozhong@foxmail.com

2. 宋卡王子大学北大年校区,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大年, 94000, 泰国

电子邮箱: mingxin.f@psu.ac.th

3. 新竹清华大学, 科技管理学院, 新竹, 300044, 中国

电子邮箱: sedakaratas@outlook.com

收稿日期: 2021-02-05

修回日期: 2021-06-27

接受日期: 2021-06-29

摘要: 在进行历史学研究时, 学者们常以民族或语言来划分云南人口, 但此种分类方式却无法解释为何属于相似族群或操相近语言的人群在面对国家时常有不同的反应。故为了理解云南人口与国家的关系, 文章将研究时段放在中央政府重新直接统治云南的元代, 并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云南人口进行分类。由此发现, 因为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中, 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也各有不同, 所以拥有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人口与国家间的关系各不相同。

关键词: 云南; 元朝; 经济-文化类型; 关系

引言

在以往对云南历史的研究中，前辈历史学家多依“历史-民族”甚至语言对这个多族群的边疆省份的人口分类，进而开展他们堪称经典的研究。各种有关云南的民族史专著¹以及民族史丛书多是如此。²这其实是对早就定型了的“中国民族史”书写体例的继承，³在本质上和古人对族群系谱的编排较为类似。而各种关于云南的边疆史、地方史乃至经济史作品，一旦论及少数民族，其体例也多立即回到依语言或民族分类的套路上。⁴大家都“把民族史叙述成为一个‘纳四边裔入中华’的百川归海过程。”⁵

但当试图通过阅读那些著作以期了解云南的人口，特别是其少数民族人口和国家的关系时，困惑便产生了：为什么操相近语言、拥有类似“历史-民族”背景的人群在面对国家时却多能见到种种不同的反应？而至迟到明代，人们就已经发现这类问题了。如，天启《滇志》即引旧《云南通志》，称：樸喇，“在宁州者强悍，专务剽。石屏州者良善畏法，为编民。”⁶这样，采

¹ 如，方国瑜：《云南民族史讲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尤中：《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² 如，《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当代云南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和《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等。

³ 如，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20年；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京：文化学社，1928年；宋文炳：《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华书局，1935年；施璜：《中国民族史讲话》，上海：世界书局，1945年；江应樑：《中国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⁴ 如，何耀华总主编：《云南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李珪：《云南近代经济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

⁵ 葛兆光：《纳“四裔”入“中华”》，《思想》第27期，2014年，第27页。此外也有将云南作为一个地区来探讨其社会经济情况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的。如，李中清著，林文勋、秦树才译：《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⁶ 刘文征：《天启滇志·地理志》，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取“历史-民族”甚至语言分类的研究并不能就此情况给我们提供很好的解释。

“经济-文化类型”（economic-cultural types）理论应对的就是我们想要理解的这类情况：“语言互异的族系，其文化在许多情况下是极为相似的，反之，语言相近的族系，其文化却又很大的区别。”¹“经济-文化类型”即“经济类型”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经济类型”的划分不仅得注意作为基础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方向，还应注意生产方式，即社会经济水平。而这里说的“文化特点”指的是那些由“经济类型”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²或者说：“经济文化类型是指一定的经济与文化的综合体，它在历史上形成于处在相似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居住在同样自然地理条件下的不同民族中。”³而社会制度是和“经济-文化类型”相联系的，⁴即某一人群所采用的生产方式对该人群和政治、国家的关系有着最为根本的影响。⁵

之所以要讨论元代云南的“经济-文化类型”，原因有三。其一，蒙古-元朝时期是中国中央政府重新直接统治云南的开始，要想深入理解当时乃至

¹ 莫·格·列文 (Maksim Levin)、恩·恩·切波克萨罗夫 (Nikolai Cheboksarov) 撰，叔于田译：《经济文化类型与历史民族区》，《民族问题译丛》民族学专辑，1956年，第30页。

² 莫·格·列文 (Maksim Levin)、恩·恩·切波克萨罗夫 (Nikolai Cheboksarov) 撰，叔于田译：《经济文化类型与历史民族区》，第31页。

³ 尼·切波克萨罗夫 (Nikolai Cheboksarov)、伊·切博克萨罗娃 (Irina Cheboksarova) 著，赵俊智、金天明译：《民族·种族·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207、213页。关于该理论的综述可参看：林耀华：《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9-97页；黄淑姆、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96-399页；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67-184页；张继焦：《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宋敏主编：《边疆发展中国论坛文集（2010）发展理论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2-217页。

⁴ 莫·格·列文 (Maksim Levin)、恩·恩·切波克萨罗夫 (Nikolai Cheboksarov) 撰，叔于田译：《经济文化类型与历史民族区》，1956年，第35页。

⁵ “每一种生产体系都存在着一套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著，郭忠华、潘华凌译：《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46页。或者说：生产关系的类型决定了政治、国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里格比 (Steve Rigby) 著，吴英译：《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25页。

后续历史时期中云南人口与国家的关系，我们必须以对元代情况的研究作为基础。其二，对于元代云南的前工业社会，“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文化发展作用”的明显程度也让“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此非常适用。¹“人类学的生态学观点”也一直接受马克思的设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普遍特征。”²其三，对于计量史学来说，元代云南的情况就像经济史专家认识到的那样，“大量有关经济史料都缺乏整理或缺不全。”³而比起基于新古典理论的经济史研究，马克思（Karl Marx）的政治经济学又特别“试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整合在一起。”⁴

林耀华先生曾与切博克沙罗夫合作，对现代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了分类。其中涉及云南的有：“温暖的森林地带采集者和狩猎者的类型”、“山区采集者、猎人和渔人的类型”、“湿热气候带的锄掘农民类型”、“高山农民”类型、“高山游牧民类型”、“暖湿带耕耘农民类型”和“高山耕耘农民”类型。⁵这可以作为本次研究的先导和参照。

在本次研究中，要使用的历史文献主要为元代的《混一方輿胜览》和《云南志略》，以及保存了明代初年洪武《云南志》内容的《云南图经志

¹ 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第83页。之前有部分学者在使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时因理解上的偏差，将关于“精神文化”的论述融入研究之中；又常忽略“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性；使研究成果的“参考价值大大降低。”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第80-83页；李伟、杜生一：《对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认识》，《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49-54页。本文将较为严格地选取研究对象，尽量剔除各种干扰因素。

² 唐纳德·L.哈迪斯蒂（Donald L. Hardesty）著，郭凡、邹和译：《生态人类学》，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³ 秦佩珩：《史海夜航：我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看法》，文史哲编辑部编：《考据与思辨：纹饰治学经验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2页。

⁴ 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第157页。

⁵ 林耀华、切博克沙罗夫（Nikolai Cheboksarov）：《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林耀华：《民族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09-110、116-117、122、129-130、140页。

书》。¹《云南民族史》和《中国西南民族史》等书会被作为近人书写云南诸族历史的典范进行参考。²对云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则以《云南省农业气候条件及其分区评价》³及《云南省综合自然区划》⁴中的分类为判别依据。

1253 年（大理天定三年，蒙古宪宗三年），蒙古忽必烈、兀良合台攻入云南地方。大理宰相中国公高泰祥被俘殉国，皇帝段兴智投降后获封摩诃罗嵯（mahārāja）、大理总管。此后，蒙古在主要操白语（Bai language）、彝语（Loloish languages）的云南靠内地区设了十九个万户府，以下为千户所、百户所，其官员多为原大理国的诸侯、贵族。但在这之后，云南的政局并不稳定，如元世祖曾在云南设行政机构大理等处行六部、军事机构大理等处宣慰都元帅府，又于至元四年（1267 年）封忽哥赤为云南王，命之统辖流行白语的大理和善阐（今昆明市）、流行纳西语（Naxi language）的察罕章（今丽江市）、流行彝语的赤秃哥儿（今贵州西部）、流行台语（Tai languages）的金齿（今云南西南部）等地，但在至元八年，行六部尚书、都元帅竟合谋毒杀了云南王。终于，至元十一年开始，在皇帝的支持下，赛典赤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云南行省，其下设置了路、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同时，元朝也在云南进行了军屯、民屯两种屯田，军屯的军户主要是派至云南驻守的蒙古、色目、汉军，及部分云南的寸白军。从事民屯的则主要是与寸白军为同族的白语人口。⁵

¹ 王叔武：《洪武云南志书》叙例，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73-74 页。且此书也大量援引了《混一方輿胜览》的内容。

²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尤中：《云南民族史》，1994 年。

³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云南省农业气候条件及其分区评价》，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年。

⁴ 杨一光：《云南省综合自然区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

⁵ 马曜主编：《云南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01-124 页；尤中：《云南民族史》，第 261-291 页。

以下，我们将以六个章节分别讨论元代云南的六种“经济-文化类型。”¹ 每个章节先说明实践某种“经济-文化类型”的族群及其地理分布；再展示该种“经济-文化类型”的具体情况；最后讨论元朝国家与实践该种“经济-文化类型”的族群的关系。

一、热带、高原亚热带林区的狩猎采集

云南南部热带北缘雨林和云南高原亚热带南部季风常绿阔叶林中的狩猎采集者是金齿百夷诸路语言系属不明的“野蛮。”¹ 在云南高原亚热带北部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中则是各种操彝语的罗罗别种，除了顺宁府（今凤庆县）、永昌府（今保山市隆阳区）“采猎为务”的蒲蛮，² 还有临安路（今通海县）“采猎为业”的蒲刺、³ 蒙化府（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善射猎”的摩察、⁴ 北胜府（今永胜县）“猎取禽兽”的栗梦。⁵

元代云南的狩猎采集者多不从事农业活动。猎取禽兽用的生产工具是弓、弩和往往带毒的箭。此外，他们还采集草木，挖掘块茎或块根。采集、狩猎的生产方式使他们往往居住在山林、洞穴之中，并不建造固定的房屋。有些甚至因为缺乏织物纤维，只能用木、皮遮蔽身体。而由于生活环境较为温暖，他们大多赤脚跣足。

¹ 李京：《云南志略》，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不著撰人：《混一方輿胜览·云南行中书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多认为此“野蛮”与景颇族有关，但其多妻习俗似乎与景颇习惯不合。

² 不著撰人：《云南图经志书》卷4，林超民等主编：《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不著撰人：《云南图经志书》卷6，第358页。

³ 不著撰人：《云南图经志书》卷3，第176-177页；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3-287页。

⁴ 不著撰人：《云南图经志书》卷5，第325页。

⁵ 不著撰人：《云南图经志书》卷4，第282页。

这些不定居的狩猎采集者虽已有了村落和酋长，¹他们与朝廷的关系仍较为疏远，故元代很少见到有关他们的文献。即便北胜的栗梦在明代已有缴纳赋税的记录，也只是“岁输偿者惟皮张耳。”

二、高原亚热带盆地的渔业

在云南高原亚热带南部湖盆高原区，²昆阳州（今晋宁县）滇池的岸边有被称作普特的“罗罗之别种”，他们“得鱼输税。”³在云南高原亚热带南部高原盆地峡谷区，⁴建水州（今建水县）的水滨也有“非爨非僰”的些袁蛮，他们同样“捕鱼为生”。⁵

据当代学者研究，些袁蛮其实也是一种罗罗。⁶虽然都是使用彝语的族群，但普特、些袁蛮二族和之前提及的几种从事狩猎、采集的罗罗不同，他们并不从事农耕，却以渔业为生。普特、些袁蛮二族都居住在水边，他们因着濒水的便利捕捉鱼、螺等生物，而水产往往在捕获之后就被生食了。关于这些居住在水边茅屋里的渔民，历史文献能提供的渔业生产、日常生活记录也就仅止于此了。

由于昆阳靠近云南的行政中心中庆路，普特渔民被纳入了元朝的税收体系，他们不仅是为了食物而“出入水中”，还需要“得鱼换米以输税。”而

¹ 生产组织的继嗣方式和生产方式二者的关系现无定论。唐纳德·L. 哈迪斯蒂（Donald L. Hardesty）著，郭凡、邹和译：《生态人类学》，第 74-77 页。且文献中往往阙如，在此就不多做尝试了。

² 杨一光：《云南省综合自然区划》，第 139 页。

³ 不著撰人：《云南图经志书》卷 1，第 112 页。

⁴ 杨一光：《云南省综合自然区划》，第 199 页。

⁵ 不著撰人：《云南图经志书》卷 3，第 188 页。

⁶ 街顺宝：《徙莫只考》，林超民主编：《新松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51 页。

在距离中庆路稍远的建水，些袁蛮则仍处于“无求于世”的状态，渔获之于他们只是食物罢了，他们和朝廷乃至外界都没有太多往来。

三、亚热带山地林区的游耕农业

乌蒙路（今昭通市昭阳区）及以北地区属亚热带北部的山地高原区，在当地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¹中有击齿、悬棺，明显操台语支某种语言的土獠蛮。²马龙他郎甸司（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亚热带南部地带中山山原地区的季风常绿阔叶林³里则有操彝语的车苏，“蒲蛮之别种曰车苏者即蒲刺也”。⁴

虽然一个在滇西北一个在滇东南，但土獠蛮、车苏都从事游耕农业。他们在林木覆盖的山地上进行面积不大的刀耕火种，在地力消耗之后就迁徙别处再行开荒，其频率甚至达到了“一岁一移其居。”此种耕作方式显然是“不资水利”的。在游耕之外，土獠蛮尚会采荔枝，贩茶作为补充，而车苏在有空时也会猎取野兽以供食用。因居于山林且经常迁徙，他们多使用木器：土獠蛮女子冠桦皮，车苏则“器用木勺。”

在贩卖茶叶时，游耕者肯定得和商人或定居农民等外人打交道。他们便是如此在经济活动中与元朝发生间接的联系。

¹ 杨一光：《云南省综合自然区划》，第137-139页。

² 李京：《云南志略》，第130页；不著撰人：《混一方輿胜览·云南行中书省》，第108页。

³ 杨一光：《云南省综合自然区划》，第186-189页。

⁴ 不著撰人：《云南图经志书》卷3，第228页。

四、熱帶低地的鋤掘農業

在上文中，我們見到了亞熱帶山地林區中操台語、從事游耕的土獠蠻，也見到了熱帶林區中以狩獵、採集為生的“野蠻。”而在元朝的金齒百夷諸路，即雲南南部熱帶北緣地帶的山間盆地、河谷地區，操台語的百夷卻既不像其土獠蠻親族那樣從事游耕，也不像“野蠻”鄰居那樣從事狩獵、採集。據元代的《雲南志略》、《馬可波羅行紀》和明初的《百夷傳》、景泰《雲南志》等書可知，百夷農民從事的是鋤耕農業。¹

在他們的聚居區，“地多平川，土沃人繁，村有巨者，戶以千百計，然民不勤於務本，不用牛耕，惟婦人用鋤鋤之，故不能盡地利。”百夷農民種植並食用的糧食品種是“秣”，即糯稻，一年兩熟。農民作為人口歸領主所有，聽領主使令。村舍中農民耕種的土地亦為領主所有。領主則“食其所賦，取之無制，用之無節。”和上章里“不資水利”的游耕農業不同，這些農田需要灌溉，而相應的水利工程也是在領主的指揮下進行建設的。²

除了作為主要生計方式的農耕之外。元代的百夷人在經濟活動中也以貿易、漁獵作為補充。他們不僅採集茶葉販賣；而且已經學會了之前不曾知曉的絲織技術，³“地多桑柘，四時皆蠶”；至於飼養的牲畜則是“馬、山羊、雞、豚、鵝、鴨之屬。”此外，百夷人使用藤器、陶器，還能鍛造鋼鐵。因為生活在卑濕高溫的熱帶地區，他們的男子皆髡首，纏頭；女子帶大笠；無論男女皆著裙，跣足；多嚼檳榔；不分貴賤都居住在以覆草為頂，不用陶瓦的竹樓上。且像熱帶地區的其他不少定居農民一樣，“男貴女賤”：“盡力

¹ 方國瑜：《傣族區域風土記》，《元代雲南省傣族史料編年》，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3卷，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8-61頁；《傣族簡史》編寫組：《傣族簡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88-91、111-113頁。

² 張公瑾：《西双版纳傣族歷史上的水利灌溉》，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編：《張公瑾文集》卷2，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7-24頁。

³ 在南詔大理時期，這一地區只有木棉及其產品。李曉岑：《南詔大理國的幾項科技成就》，《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第55-56頁。

农事，勤劳不辍”的往往是妇女，男子却或为产翁照顾孩子，或战争，游猎，养鸟。

百夷农民不仅耕作在属于领主的土地上，其农田的灌溉也由领主安排。比起之前所见的几种“经济-文化类型”，国家在锄掘农业活动中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五、高原亚热带盆地的犁耕农业

元代云南的犁耕者与上文中操彝语的渔民生活在相近的区域。从洱海到滇池，他们的农田其实也就位于和高原亚热带林地毗邻的一个个高原亚热带盆地之中。¹

元朝在云南从事军屯的屯田军士除了由云南僰人组成的寸白军，还有来自内地军士，后者使用的农耕技术应与当时内地的区别不大。军屯之外还有民屯，与屯田军士一样，民屯者也是国家的佃农。云南的民屯多是“自带己业田”或“官给无主荒田”的僰人。从《南夷书》中记载的屯田者和赛典赤的对话里能看出，他们中至少一部分原先也是熟悉犁耕的农民。²其他僰人人口也大部分作为农民耕种在段氏总管及以下各级领主的庄园里，或地主的土地上。³另有一部分从事农耕的则是原先居住在山地的罗罗，他们因倾慕农耕生活而归顺了元朝国家。⁴但从事农耕的乌蛮并非元代才出现，回忆南诏建国前夕，当观音去蒙舍乞食时，细奴逻就是正在“与子罗晟耕于巍山之下。”⁵

¹ 尤中：《云南民族史》，第 297-299 页。

² 尤中：《云南民族史》，第 285-289 页。屯田的分布，见，吴宏岐、汪新庄：《元代西南地区农牧经济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 年第 4 期，第 85-86 页。

³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 523-524 页；尤中：《云南民族史》，第 299-300 页；《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16-118 页。

⁴ 尤中：《云南民族史》，第 290 页。

⁵ 不著撰人：《白古通记》，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62 页。

比起同时代的内地省份，云南的犁耕技术还是略落后一些。在犁耕时，明清云南府、大理府的土人，乃至近代宁蒗的纳西人、剑川的白人仍需人压犁。¹此情况说明，在包括元代的历史时期里，这些农民们一直都在使用直辕犁。²该种犁在《南诏图传》中就已经能看到了。³依郑张尚芳的研究可知，白语、汉语同属汉白语族（Sinitic languages），而白语的“犁”、“轭”二词与汉语的犁和轭存在对应关系，犁，白语 [tɕi⁵⁵]：前期上古汉语（Early Old Chinese）[*ri:l]；⁴轭，白语 [ŋɛ⁴]：前期上古汉语 [*qre:g]。⁵则他们开始犁耕远比南诏时代早得多。⁶除犁耕之外，爨人种植的麻、麦、蔬、果也和内地的类似。⁷

大理后期的混乱政局使滇池水利失修，让周边地区旱涝无常。元朝的赛典赤于是主持了对滇池的治理。⁸此项工程是为滇池边中庆路的农业区服务的。和他们南诏-大理时代的前辈一样，爨人官员很了解水利对于农业的重要性。例如出身大理官僚家族的王惠就曾在昆明县“大兴水利，安集流民。”⁹犁耕农业的顺利实现没法不依赖靠个人力量无法完成的大型水利工程，于是在该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中，有能力进行水利建设的国

¹ 李昆声：《南诏农业议》，《思想战线》1983年第5期，第56-57页；李昆声：《唐代云南“二牛三夫”耕作法民族学新证》，《农史研究》第5辑，1985年，第205-207页。

² 李朝真：《从白族的“二牛三人”耕作法看汉代的耦耕法》，《农史研究》第5辑，1985年，第209页。

³ 周昕：《中国农具通史》，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523-525页。

⁴ 本文采用了郑张尚芳的汉语拟音。“前期上古汉语”代表了周代的汉语语音。林连通、郑张尚芳总编：《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

⁵ 郑张尚芳：《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白族文化研究》2003，第299、306页。

⁶ 据推测，云南用牛犁耕始于东汉时期。李昆声：《云南牛耕的起源》，《考古》1980年第3期，第266-271页。

⁷ 李京：《云南志略》，第128页。

⁸ 李炳东、俞德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农业卷》，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364页。

⁹ 李源道：《为美县尹王君墓志铭》，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0页。南诏-大理的水利建设情况，见，《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第212-213页。

家必然处在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曲靖路、鹤庆路，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又对利益斤斤计较的汉人、僰人农民是如此依赖朝廷的权威，以致于他们在历史中留下了“好器讼”的名声。而散居在曲靖村落中的罗罗一旦来到城市里买卖，则往往会被汉人和僰人骚扰。¹

至迟在南诏时期，云南的犁耕农民就居住在有房梁、屋檐的建筑中了，当地建筑常有回廊，和内地的差异不大。²但他们仍保有生食肉类的饮食习惯。在服饰方面，他们男女皆戴一种类似斗笠的帽子，“男子披毡椎髻”，女子亦“以半身毡为上服装”。³据下文将要呈现的情况来看，这些毛毡应该是犁耕农民与附近山地牧民进行贸易的结果。

对于犁耕农业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国家对生产活动的顺利实现通过水利建设起着极重要的作用。高原亚热带盆地的犁耕农民无疑期待着一个有力的国家出现在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之中。如此看来，这些人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确实是被他们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⁴

六、亚热带中山高山的游牧业

从上文关于盆地中犁耕农民的讨论能看到，云南地区的羊毛纺织业就极发达，当地亦相应地流行穿用毛毡，这是自南诏-大理时代就已形成了的传统。⁵这些纺织原料的来源则是盆地周边的山地上从事游牧业的人口。在滇池-洱海一线往北，西边操彝语、羌语（Qiangish languages）、藏语

¹ 金毓黻、安文溥辑：《元大一统志辑本》，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8-99页。

² 《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第214页；林超民、段玉明主编：《云南通史》第3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05-306页。

³ 不著撰人：《混一方輿胜览·云南行中书省》，第104页；李京：《云南志略》，127-128页。

⁴ 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第83页。

⁵ 李晓岑：《南诏大理国的几项科技成就》，第56页。

(Tibetan)¹的牧民“夏则山颠，冬则平野以居，而畜牛马，有草则住，无草则移，初无定所。”²东边操彝语的也同样是夏牧场在山地，冬牧场在河谷。

3

在元代的云南，这些从事游牧业的人民主要生产羊、马、牛、毛毡、乳制品。而蒙古人建立的朝代确实对游牧业有相当理解，国家在当地设置了云南、亦奚卜薛两道牧地。⁴牧民中也有参与了民屯的，赛典赤允许他们将繁息来的马、牛作为缴纳给国家的租税。⁵

因为“游牧不是一种能够自给自足的业手段”，所以一方面匈奴、西羌、乌桓和鲜卑等不少游牧人群都会有作为辅助性生计的农业与游牧经济来配合，⁶而另一方面“游牧经济与商业贸易是天然的伴侣，交换是游牧民族维持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方式之一。”⁷毕竟自出现之始，游牧经济就无法不依靠农耕经济而独自存在，否则单是牧民维生所需的粮食就难以获得。⁸而具体到

¹ 元代的丽江路就有罗罗分布。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 529 页。但如今迪庆州的彝族则称他们的祖先在清代才从凉山迁来。刘群主编：《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225 页。

² 不著撰人：《云南图经志书》卷 4，第 273 页。

³ 这些河谷地区在明代中后期将被汉人移民占据。罗康隆：《西南诸民族的文化类型试析》，《吉首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4 期，第 66 页。

⁴ 吴宏岐、汪新庄：《元代西南地区农牧经济的发展》，第 86-89 页。常有学者将这两道牧地混为一谈，如，李幹：《元代民族经济史》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674 页。而之后的明朝显然未能继续这一政策。梁方仲：《明代马政》，《梁方仲读书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476-484 页。

⁵ 尤中：《云南民族史》，第 286 页。

⁶ 王明珂：《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 年第 1 分，第 28-31 页。

⁷ 杨建新：《序》，贺卫光：《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序第 2 页。亦参见，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 年第 4 期，第 464 页。

⁸ 即“游牧民族之生产不能自给自足，依赖农耕社会供给其不足使。”及《论汉廷与匈奴关系之财务问题》一文中对札奇斯钦及萧启庆的观点的综述。廖伯源：《论汉廷与匈奴关系之财务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8 年，第 1-2 页。亦参见，李根蟠：《中国古代的农牧关系》，《平准学刊》第 1 辑，1985 年，第 25 页；贺卫光：《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互补与非平衡需求》，《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第 33 页。

云南的情况，当地牧民不仅从事牧业，有时也种植块根乃至谷物作为食品。¹且他们获得粮食、植物纤维织物、金属工具等必需品的的方式也少不了与农民的贸易，乃至掠夺甚至战争。如此，牧民们常常战斗，又“颇通商贩，牵牛马，载皮囊，远近赴市。”²云南牧民的住处由木板或松皮搭建。³毛毡除了穿着之外还作为寝具使用。⁴他们有使用木器、漆器的习惯，但并不使用陶器。⁵据龚煌城的研究可知，漆，藏缅语（Tibeto-Burman languages）、汉语用的是同一个词。则在汉藏语（Sino-Tibetan languages）尚未分化的时代，操汉藏语的人群就已经了解此种技术了。⁶漆，凉山彝语 [tɕ₁³³]：前期上古汉语 [*shig]。⁷

由于云南的山地牧区地形破碎，故当地“酋寨星列，不相统摄”，⁸“恃其形势”，“叛服不常，号为难治。”⁹游牧民在政治形态方面有些类似王明珂描述的汉代羌人，“他们的部落分立、各为其主而又能迅速聚集。”但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在河谷种麦，在山地放牧”的羌人是“‘平等自由’的部落人群”，¹⁰而云南牧民，尤其是各种罗罗的社会却像蒙古草原上的一样等级森严。且一方面由于从事游牧经济者必须要以各种手段从外界补充粮食、

¹ 不著撰人：《云南图经志书》卷 2，第 146 页；不著撰人：《云南图经志书》卷 5，第 343 页。

² 不著撰人：《云南图经志书》卷 3，第 205 页。

³ 金毓黻、安文溥辑：《元大一统志辑本》，第 98 页。

⁴ 李京：《云南志略》，第 128-129 页。

⁵ 黄建明：《彝族文化遗产》，陈理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集粹》，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2-3 页。《彝族简史》编写组：《彝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305 页。

⁶ 龚煌城：《从原始汉藏语到上古汉语以及原始藏缅语的韵母演变》，《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组》，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 年 4 月，第 195 页。

⁷ 可将之与同韵的“血”对比，血，凉山彝语 [s₁³³]：前期上古汉语 [*q^hwi:g]。

⁸ 李京：《云南志略》，第 130 页。

⁹ 金毓黻、安文溥辑：《元大一统志辑本》，第 98 页。不著撰人：《混一方輿胜览·云南行中书省》，第 111 页。李兰盼等：《元一统志·丽江路二州》，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 3 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92-97 页。

¹⁰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200-203 页。

金属工具等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由于元朝在当地设置了牧地，无论“叛服”，云南牧民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和国家发生联系。

结 论

在考察了元代云南的六种“经济-文化类型”之后，¹能看到某一族群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他们的语言、“历史-民族”情况都很难建立必然的联系。如操彝语的罗罗就落在五种“经济-文化类型”之中，操台语的族群也有游耕、锄掘两种农业。而不同“经济类型”的族群虽然常是邻居，但与国家的关系明显不尽相同。如果国家对某一族群的经济活动较为重要，该族群便会与国家产生强烈的依赖。要是国家在某一族群的经济活动中影响不大，该族群与国家的联系就不会那么紧密。

对操彝语的狩猎采集者、渔民和操彝语、台语的游耕者来说，除了少见的贸易、赋税以外，元朝国家在其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并不明显。故这些人口及其经济活动和朝廷关系较为疏远。

同样操台语，在热带北缘锄耕定居农民的农业生产中，国家的角色则非常重要。毕竟他们耕作的土地归各级领主所有，至关重要的水利建设也离不开国家的组织。对高原亚热带盆地操汉藏语的犁耕农民来说，情况也差不多。不过在这一地区，农田分属于国家和其他私人。²

¹ 这些经济类型没有高下之分，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经济类型时也并非只沿着单一的方向。陈庆德：《经济人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7页。

² 元代的土地分为国家所有的不可买卖的官田和私人所有的可买卖的民田。屯田和牧地其实都是属于官田。官田上的劳动者只须向国家缴纳田租，并无赋役。梁方仲：《元代的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86-287页；曾雄生：《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年，第189-190页。这样看来，官田明显是一种土地国有制。朱寰：《论封建土地国有制的性质问题》，《学思录：朱寰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而对于游牧民来说，破碎的地形固然阻碍了国家在当地的形成，可由于游牧经济的特点，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朝廷编户齐民的定居农民以各种方式进行物资交换。除了那些放牧在国家土地上的之外，操彝语、纳西语和普米语（Pumi language）的牧民便这样间接地和国家发生联系，而他们的部落首领也常会接受朝廷授予的官爵。¹当国家作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或劳动工具的提供者时，仰赖国有土地或水利设施过活的牧民、定居农民无疑会需要朝廷的存在。至于游牧在国有土地之外的牧民，他们也会乐于与被国家统治着的农民顺利地交换物资。

总之，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不同，拥有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人口，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也会存在差异。

参考文献

古籍

- 李兰昫等 1998 《元一统志·丽江路二州》，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不著撰人 1981 《白古通记》，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不著撰人 1998 《混一方輿胜览·云南行中书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不著撰人 2003 《云南图经志书》，林超民等主编：《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 金毓黻、安文溥辑 1998 《元大一统志辑本》，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¹ 尤中：《云南民族史》，第305-306页。

- 李京 1998 《云南志略》，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李源道 1998 《为美县尹王君墓志铭》，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刘文征 2001 《天启滇志·地理志》，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近人著述

- 《白族简史》编写组 1988 《白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傣族简史》编写组 2009 《傣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
- 《彝族简史》编写组 2009 《彝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
-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2013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曾雄生 2013 《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陈庆德 2001 《经济人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
- 道格拉斯·C. 诺思（Douglass C. North） 2014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 方国瑜 1998 《傣族区域风土记》，《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方国瑜 2013 《云南民族史讲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方铁、方慧 1997 《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方铁主编 2003 《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龚煌城 2003 《从原始汉藏语到上古汉语以及原始藏缅语的韵母演变》，《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论文集语言组》，台北：中央研究院，4月。

- 何耀华总主编 2011 《云南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黄建明 2006 《彝族文化遗产》，陈理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集粹》，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 黄淑娉、龚佩华 1996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江应樑 1990 《中国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
- 街顺宝 1996 《徙莫只考》，林超民主编：《新松集》，云南大学出版社。
- 李炳东、俞德华主编 1996 《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农业卷》，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李 幹 2010 《元代民族经济史》，北京：中华书局。
- 李 珪 1995 《云南近代经济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李中清 2012 《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秦树才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里格比 (Steve Rigby) 2012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梁方仲 2008 《明代马政》，《梁方仲读书札记》，北京：中华书局。
- 梁方仲 2008 《元代的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论》，北京：中华书局。
- 林超民、段玉明主编 2011 《云南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林惠祥 1922 《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 林连通、郑张尚芳总编 2012 《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林耀华 1997 《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林耀华、切博克萨罗夫 (Nikolai Cheboksarov) 1985 《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林耀华：《民族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刘 群主编 2003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吕思勉 1920 《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
- 马 曜主编 1983 《云南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尼·切波克萨罗夫 (Nikolai Cheboksarov)、伊·切博克萨罗娃 (Irina Cheboksarova) 1989 《民族·种族·文化》，赵俊智、金天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 秦佩珩 2013 《史海夜航：我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看法》，文史哲编辑部编：《考据与思辨：纹饰治学经验谈》，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施 瑛 1945 《中国民族史讲话》，上海：世界书局。
- 宋文炳 1935 《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华书局。
- 唐纳德·L.哈迪斯蒂 (Donald L. Hardesty) 2002 《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北京：文物出版社。
- 王明珂 2006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叔武 1981 《洪武云南志书》叙例，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王桐龄 1928 《中国民族史》，北京：文化学社。
- 王钟翰 1994 《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建新 2001 《序》，贺卫光：《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 杨一光 1991 《云南省综合自然区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杨毓才 1989 《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尤 中 1980 《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尤 中 1985 《中国西南民族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尤 中 1994 《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张公瑾 2013 《西双版纳傣族历史上的水利灌溉》，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编：《张公瑾文集》卷 2，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张海洋 2006 《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北京：民族出版社。
- 张继焦 2012 《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宋敏主编：《边疆发展中国论坛文集（2010）发展理论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 1964 《云南省农业气候条件及其分区评价》，北京：科学出版社。
- 周 昕 2010 《中国农具通史》，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 朱 寰 2008 《论封建土地国有制的性质问题》，《学思录：朱寰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期刊论文

- 邓 红、李天雪 2006 《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广西民族研究》第 3 期。
- 葛兆光 2014 《纳“四裔”入“中华”》，《思想》第 27 期。
- 贺卫光 2003 《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互补与非平衡需求》，《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李 伟、杜生一 2002 《对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认识》，《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李朝真 1985 《从白族的“二牛三人”耕作法看汉代的耦耕法》，《农史研究》第 5 辑。
- 李根蟠 1985 《中国古代的农牧关系》，《平准学刊》第 1 辑。
- 李昆声 1980 《云南牛耕的起源》，《考古》第 3 期。
- 李昆声 1983 《南诏农业雏议》，《思想战线》第 5 期。
- 李昆声 1985 《唐代云南“二牛三夫”耕作法民族学新证》，《农史研究》第 5 辑。
- 李晓岑 1994 《南诏大理国的几项科技成就》，《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廖伯源 2008 《论汉廷与匈奴关系之财务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 罗康隆 1996 《西南诸民族的文化类型试析》，《吉首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莫·格·列文（Maksim Levin）、恩·恩·切波克萨罗夫（Nikolai Cheboksarov）1956 《经济文化类型与历史民族区》，叔于田译，《民族问题译丛》民族学专辑。
- 王明珂 1993 《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 分。
- 乌 恩 2002 《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第 4 期。
- 吴宏岐、汪新庄 1993 《元代西南地区农牧经济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4 期。
- 郑张尚芳 2003 《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白族文化研究》。